

我來·我譯·我追憶

——《格理弗遊記》背後的「遊記」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單德興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對我來說，參與國科會的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計畫，是畢生難得的機會與「奢侈」，不僅是理念的實驗，探索的過程，更是理想的實現。經過多年醞釀，努力準備，字斟句酌，反覆琢磨，多次修訂，終於殺青、出版，回顧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心中感觸良多。

正名篇：「學術翻譯」

提到「學術翻譯」，首先該面對的就是這個名詞的定義或歧義。定義之一就是翻譯的原著本身是具有歷史意義、學術價值、典範地位的文本，在這種情況下，身為「學術翻譯」的經典譯注計畫就是針對具有歷史性、學術性、典範性的文本之翻譯與評注。

然而這類作品不乏中譯本，國科會的經典譯注計畫又如何與之區隔，樹立特色？答案在於：固然一般的學術或經典翻譯可能也有緒論或譯注，但並不是必要的、強制性的，因為出版社往往不會如此要求或苛求於譯者，譯者也未必有意圖、能力、時間或精神去做這些「額外服務」；即使譯者有心如此，也未必有足夠的條件對出版社提出這些建議或要求，而出版社基於成本和市場的考量，或合約的時限，可能希望譯者不要多此一舉，徒增製作與印刷的成本，延遲上市的時程，甚至遭到原著授權人依合約授權年限取消翻譯版權。換言之，對一般翻譯而言，緒論或譯注並非必要。

相對地，經典譯注計畫則標榜翻譯結合學術，因此譯者就是學者（雖然學者未必就是好譯者，因為翻譯還涉及語文轉換、文字技巧、翻譯理念等問題），不僅將其研究心得隱含於譯文之中，而且透過譯注計畫所要求的緒論／導讀、譯注、年表、參考資料等「額外服務」或「周邊設備」，表現於譯文之外，凸顯其研究成果。在這種情況下，「學術翻譯」的第二個定義於焉產生，也就是結合了學術研究的翻譯。

根據以上兩個定義，也可導出第三個定義。既然翻譯的作品是經過時間考驗、學術評量的經典之作，而且在翻譯中結合、融入了學術心得，那麼成品理當比一般翻譯更有品質保證。因此，其成果不僅如上述的是經典、學術文本的翻譯，是帶有研究心得、具有學術價值的翻譯，甚至本身可能成為學術研究對象。換言之，「學術翻譯」的第三個定義就是本身可成為學術研究對象的翻譯。如此一來，譯注者不僅不再是乏人矚目的「隱形人」，「為他人作嫁」的中介者，反倒可能「公親變事主」，成為被研究的對象。

建制篇：經典譯注計畫之緣起與規劃

國科會的經典譯注計畫其實是國內學術與文化界一個「化危機為轉機」的典型案例。原先官方負責主持翻譯大業的單位是國立編譯館，然其任務由最初的「為譯而編」，到「為編而譯」，後來以「編寫教科書」為主要業務，以致分配到翻譯的預算寥寥無幾，背離了設立的宗旨。而編寫教科書在許多人眼中是以國家機器介入教育（用阿圖塞的說法就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1996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教改會）為了達到教育鬆綁的目標，避免灌輸僵化的意識形態，加上其中留美菁英學者普遍認為懂得英文此一國際語言便已足夠，無需翻譯，遂有廢除國立編譯館之議。

曾經與國立編譯館打過交道，對其愛深責切、甚至迭有怨言的若干學者與譯者，憂心於編譯館的裁撤將使國內原本已然嚴峻的翻譯生態更趨惡化，於是相約與幾位教改委員見面，包括時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的黃榮村教授。記得當時我和余伯泉、錢永祥、李明輝等人前往說明時，其中一位教改委員明言：為了廢除國立編譯館的教科書主編權，即使犧牲翻譯也在所不惜。幸而身兼教改委員暨國科會人文處處長的黃榮村教授，能以宏觀的視野察納我們的建言：改善國內翻譯生態，提昇翻譯及譯者的地位，促進文化財、文化資本的輸入，建構本土和華文世界的學術語彙，落實學術本土化……換言之，便是透過適當的機制，以具有學術公信力的國科會來提倡翻譯，健全國內翻譯生態，甚至促成國科會與國立編譯館之間的良性競爭。在我日後參與籌劃的過程中，也進一步了解國科會方面的其他考量：如何促進學術與社會接軌，讓經典於本土生根，善用無升等壓力但無意申請研究計畫的教授之多年教學與研究經驗等。

為了與民間出版社及國立編譯館區隔，並遵照國科會的宗旨與目標，將其定位為「學術翻譯」，遂有「經典譯注計畫」之產生，並有如下的定義與要求：

- 一、「經典」——不同學門長久以來公認的經典（後來在年代上有所放寬，也接受當代的作品）；
- 二、「譯」——限於原文的翻譯，而不是第二手的轉譯；
- 三、「注」——此處可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
 - 狹義：專指譯注 (annotations)，即譯文本身的注解；
 - 廣義：舉凡譯注之外其他有助於讀者了解原著之「周邊設備」皆是，如
 - (一) 緒論或學術性導讀 (critical introduction)：包括作者的介紹，此作品的歷史與典範意義，歷代重要相關文獻的檢討，版本和譯本的介紹，如在中文世界的領受史 (reception history) 以及過往譯本的檢視與評論等；
 - (二) 書目及參考資料 (bibliography and references)；

(三) 年表 (chronology)……

四、「計畫」——比照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提出申請案。

經典譯注計畫在試辦期採取邀約的方式，敦請各學門學有專精的學者共襄盛舉，後來改為開放申請。為了有效地使計畫成果走入社會大眾，由國科會代表與出版學術著作聞名的聯經出版公司簽約，由其負責發行與銷售。此外，舉辦系列演講、座談，並透過報章雜誌的專文和報導，以及公共電視台的錄影轉播，冀望使此一計畫的翻譯成品更廣為流傳，嘉惠國人。這些年來相關作業要點幾經修訂，益臻完備，而國科會也不時徵詢各方意見，不斷改進。

理念篇：雙重脈絡化

我自大學時代起便開始嘗試翻譯，匆匆已逾三十載，早先是應出版社之邀，後來也主動推薦過一些作品，在多年的實作過程中逐漸累積了一些經驗和想法。至於個人在學術上的探索也讓我更深入省思翻譯的意義、策略及各種可能性。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要翻譯？更精確的提問方式就是：在翻譯生態如此惡劣的台灣，學者為什麼要冒「不務正業」之譏甚或風險來從事翻譯？如今回想起來，可以套用一句著名的廣告詞來回答：「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閱讀到好的外文作品，不忍獨享，希望藉由一己的努力，讓中文世界的人也有機會分享。

我曾經有個比喻：身為研究人員，面對翻譯的學術評價 (credit) 不高的情況，既然決定要「下海」，就不妨把泳姿調整得更漂亮些，游它個痛快。也就是說，翻譯在當今台灣的學術市場既然無名利可圖，就盡量能做到讓自己稱心，否則實在沒必要跟自己過不去。而平時的研究使我益發感受到翻譯除了語文的轉換之外，還涉及更大的文化的問題。換言之，在翻譯中文本 (text) 與脈絡 (context) 二者密不可分，除了文字的轉換之外，也涉及文化的逐譯。

這些翻譯體驗和研究心得，尤其是有關翻譯研究和弱勢族裔文學與文化研究，逐漸使我蘊生出「雙重脈絡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 的理念，這一理念脫胎自薩依德的「理論之旅行」(Traveling Theory) 和米樂的「理論之翻譯」(Translating Theory) 等論點。只不過他們是理論家，而我是實際從事翻譯者，考量與感受各有不同。簡言之，文本，尤其是文學文本，是歷史和文化的產物，自有其脈絡，在透過翻譯進入另一個語言與文化的脈絡之後，除了原意之外，還會產生新意。因此，譯者在可能的情況下要盡量掌握原文在原文化、原脈絡中的意義，「以及」譯文在異文化、異脈絡中的意義。這與晚近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以及文化研究中的翻譯轉向相當程度地不謀而合。此外，國科會的經典譯注計畫要求在緒論中評述作者與原經典的時代與典範意義，以及其在中文世界裡的意義，若先前已有中譯本則必須予以評價，並說明重譯本的必要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與意義。這種要求也恰巧符合我多年來逐漸發展出的理念與作法。

實踐篇：一步一腳印

在規劃經典譯注計畫期間，國科會爲了慎重起見，曾召開過幾次會議，多方聽取意見，希望找出具體可行的辦法，以及帶有標竿意義的經典文本。爲了達到更佳的效果，建議翻譯性質相近的經典之作，以利推廣。因此，我當初受邀時，提出的計畫是旅行文學 (travel literature)，並規劃了三部英國旅行文學經典—— Thomas More 的 *Utopia*，Daniel Defoe 的 *Robinson Crusoe* 以及 Jonathan Swift 的 *Gulliver's Travels* ——後來完成了兩部，一部是宋美瑋教授根據拉丁原文並參酌數種英譯本完成的《烏托邦》，我則是在多年奮鬥後終於完成了綏夫特的《格理弗遊記》，該書出版之後有相當一段時間心裡覺得「大事已了」、「已無憾事」。

翻譯敘事文學固然有方便之處，但翻譯像《格》書這種名聞遐邇的經典作品卻有其困難。首先，此書爲世界文學經典，坊間已有不少中譯本，此時此地爲何及如何重譯，使得譯者面臨很大的挑戰。再者，與其他經典最大的不同就是，此書由於豐富的想像，在流傳過程中經常被當成兒童文學來閱讀，更增加了翻譯的難度，也就是如何把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經典翻譯成老少咸宜的中文作品 (我的目標是九歲到九十九歲的中文讀者)，使成年讀者不覺其淺而嗤之以鼻，兒童不覺其深而裹足不前。因此，在語言風格的設定上，打一開始就構成很大的難題。此外，由於經典譯注計畫的許多規定，使得譯者必須兼顧多方面的要求。但也因爲這些要求及考量，讓我在準備與翻譯的過程中學到了多年翻譯中從未碰觸的議題，成爲最大的受益者。

一、版本

就原書而言，第一個要考量的就是版本問題。1726年《格》書以匿名方式在倫敦出版，由於書中不少內容諷刺時政，出版商莫特 (Benjamin Motte) 唯恐因文賈禍，未經作者同意便擅自竄改、刪節了若干文字和段落。綏夫特大爲不滿，遂於1735年都柏林出版的福克納 (George Faulkner) 版中宣稱倫敦出版的是「原稿的抄本」，內文有「許多的更動和增添」，而福克納版則依照原稿「比對」、「校正」，更爲可靠。歷代有關兩個版本的想法不一，有人主張1726年版是世人接觸到的第一個版本，較能代表時人的反應，有人主張1735年版較貼近作者的原意。在此書的流傳史上，以往較多人支持莫特版，但1941年戴維思 (Herbert J. Davis) 推出的校訂版使得福克納版後來居上，成爲衆多學者心目中的權威版本，儘管如此，當今印行的學術或通行版本中，兩個版本依然各有擁護者。此類版本問題是以往中譯本未曾考量的，對我也是嶄新的經驗與考驗。

在準備及翻譯的過程中，我閱讀並蒐集不同版本，曾赴愛爾蘭最早的公立圖書館馬希圖書館—— Marsh's Library，位於綏夫特擔任總鐸的都柏林聖帕提克大教堂之旁，

創辦人馬希 (Narcissus Marsh) 樞機主教與綏夫特熟識——和英國伯明罕大學圖書館特藏室閱讀他們珍藏的古老版本，也曾到全世界收藏綏夫特作品最豐富的德國慕斯特大學艾倫普萊思綏夫特研究中心 (Ehrenpreis Center for Swift Studies, Munster University) 停留十天，參加該中心四年一度的綏夫特國際研討會，並查閱其豐富藏書和不同語文的譯本。在綜合多方資訊之後，決定以 1735 年版作為翻譯的基本，並將 1726 年版的「異文」以及兩版本中都未見的「逸文」以腳註和括號的方式加以補足，成為一百多年來此書中譯本的創舉。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我會以「奢侈」一詞來形容「經典譯注計畫」，因為其他的翻譯幾乎不可能下如此多的準備工夫；即使有此準備工夫，出版社也未必支持，而這卻是「經典譯注計畫」所支持、鼓勵甚至要求的，藉此樹立特色和市場區隔。因此，第一個中文全譯詳注本的讀者不僅有機會讀到以往中譯本所沒有的資料，其中許多資訊也是一般英文本讀者所不知道的。我在比對兩個英文版本時，意外收穫之一就是依此考證出林紓的譯本《海外軒渠錄》根據的是 1726 年版或其衍生本。

二、文體

再就文體而言，原作使用的是十八世紀英文，今天看來有點古又不太古（有別於當今的英文，但又不像莎士比亞時代的英文那麼古老），為了掌握字義，多方參考英文注解本（如特納 [Paul Turner] 的注解本，而德馬利亞 [Robert DeMaria, Jr.] 的注解本特地附上時代相近的江森 [Samuel Johnson] 的字典定義）和《牛津英語大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至於中文的風格則經過了長久的思索。我最初想到的是《西遊記》的文體，因為那是中文世界深具想像力且老少咸宜的文本，待重新翻閱才發現文體過於古老，與我設定的讀者群相距太遠。接著想到的是文章傳揚華人世界的金庸，為此當時在紐約的我還到法拉盛的華人書店找到一套金庸作品的評點本，但發覺他的文字雖然通暢，但文白夾雜的文體還不是我需要的。後來只得找更晚近的作家，發覺張大春的文體比較接近我的需求。為了要抓中文的節奏，我還聽相聲，看《大宅門》的電視劇和腳本。儘管作了這些準備工夫，意圖在譯文裡達到類似的中文水準，但實際翻譯時依然得在掌握原文的字義和語氣的先決條件下，尋求譯文的通達順暢。為此，初譯稿請強勇傑同學和李宜勳同學提供意見，二譯稿請宋美璿、王安琪教授及陳岳辰同學提供意見（上述三位同學都是師大翻譯研究所的研究生）。為了檢驗學童接納的程度，譯稿也曾交給小兒紹岡和甥兒紹峰、紹宇試讀，證明不會造成中、小學生的閱讀障礙。後來在校對時，助理陳雪美、黃碧儀小姐和聯經的叢書主編簡美玉小姐又提供了修潤意見。凡此種種都需要時間與耐性，但也使品質得到進一步的保障。

三、譯注

版本與文體涉及正文的處理，譯注則更是譯注本的特色。譯注原來就不容易，愈是內涵豐富的文本愈是如此，何況此書運用了不少文學與歷史典故，其中諷刺時政之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處更予時人及後世的學者「對號入座」的樂趣。這些在較詳細的英文註解本中大都有註解，也是中文譯注者不能迴避的。如何化眾多的英文註解為清晰、可讀的中文，是譯注者必須審慎處理的。此外，英文本註解繁簡不一，有些固然是公認重要之處，面對許多說法有時「不知所以裁之」，但英文本也不免避重就輕、語焉不詳之處，這時就有「文獻不足」之嘆。如第二部《大人國遊記》第一章第二段描寫海上遭遇颶風，用上許多當時航海的專業術語、設備及描述，以示寫實。較認真的英文註解者指出，此段幾乎逐字抄自1669年的《海員雜誌》(Mariners' Magazine)，偶爾略加註解。科幻文學大家艾西莫夫(Isaac Asimov)在其註解本中運用科學知識詳加注釋，唯獨此段避而不注。面對這種情況，雖然該段在全書中無關宏旨，譯者卻不能迴避，不僅必須硬碰硬地把正文逐字逐句譯出，也希望藉由譯注協助讀者了解文本的涵義。無奈囿於時代、文化、專業數層之隔，究竟能傳達到幾分實在難以判斷，但至少譯者已經盡力了。

爲了譯注，我蒐集了許多英文版的《格理弗遊記》，注解詳盡的版本能買則買(有不少絕版書得自英美的舊書店)，買不到的就在各地圖書館影印(主要是在英國、美國和德國)。在初步翻譯的過程中，就參考了較具代表性的幾個注解本，以深入了解文義，並隨時加注。在譯注之前我已預判這項工程相當複雜，在譯注過程中更深切體會到這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原文注釋本各根據所設定的讀者群而有詳略的不同，中文注釋的詳略除了與讀者群的設定有關，也因此書兼具經典文學與兒童文學的性質更令人煞費周章。哪些資訊是中文讀者需要的？要注釋到什麼程度？如何注釋才能詳而不冗，簡而不略？愈是深入文本、愈是多看資料，愈想把相關資訊傳達給中文讀者。然而中文讀者果真需要那麼多資訊嗎？另一方面，有沒有什麼資訊是中文讀者需要而英文注解本沒有提供的？這些問題打一開始就不斷困擾我，但譯注的工作卻非進行不可，只得「且戰且走」、「摸石頭過河」，隨時修訂方向、範圍和方式，總算逐漸摸索出自己的一條路，但是否符合中文讀者需求，就只能請他們自己決定了。對身為經典譯注者的我而言，讀者能同時閱讀譯注固然很好，但若覺得譯注阻礙了閱讀則可以先只讀譯文，畢竟對一般讀者而言，譯文與注釋還是有主從之別。

在正文全稿譯出之後，我分批細讀手邊蒐集和影印的注解本，一次次加注，同時斟酌修訂正文——我自己的用語是「把全文『掃』一遍」——前前後後地毯式地掃過幾遍，至今依然記得有一次在寒夜孤燈下譯注的情景。所幸拜電腦科技之賜，可以隨時增刪，儘管如此，花在譯注上的時間與精神還是遠多於譯文，而其目標也與譯文不同——譯注是爲了協助讀者了解譯文，以資訊和詮釋爲主。我在〈有關中文譯注本的幾點說明〉中條列出參閱的十一個英文注解本，在〈緒論〉中也針對較具代表性的注解本稍加評述。總之，針對我設定的中文讀者，盡可能在譯注裡綜合英文各注解本的資訊與特色，並注明出處。

然而在逐譯的過程難免有些是無法完全傳達出的原文涵義，有些則是逐譯中衍生的新意，另外則有譯者的領會與心得。前二者於譯注中說明，以示原文的豐富，譯文的限制以及移植到中文語境時的創新，但我對於是否將個人翻譯過程中的領會與心得納入譯注頗感躊躇，擔心過於彰顯譯者的角色。某次與李爽學兄談起，鑽研翻譯學並實際從事翻譯多年的他說，其實這些正是中文譯注本的特色。於是我決定將這些納入譯注中，畢竟譯者是原文的細讀者、詮釋者與轉化者，其中的領會與心得多少會有參考價值。除了在譯注中提到字詞、技巧、前後關係之外，在每章之末也以腳註的方式對該章加以評析。這種作法其實是仿照中國古典小說評點中的「回後批」，既可避免「回前批」可能的先入為主，也可提示重點並協助讀者賞析。在編排過程中，編輯認為腳註不夠醒目，改置於每章正文之後，名曰「譯者附誌」，既可達到協助讀者的效用，也因爲是「『附』誌」而不致喧賓奪主，成爲本書的特色。如此作法，多少凸顯了譯者在逐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也是晚近翻譯研究的重點之一。

四、奧援

在翻譯過程中有些問題在書面資料中找不到答案，只好求助於國外學者，並得到德國雷阿爾 (Hermann Real) 教授大力協助。雷阿爾教授多年主持艾倫普萊思綏夫特研究中心，擔任國際期刊《綏夫特研究》(*Swift Studies*) 的主編，並曾與人合作譯注德文本的《格理弗遊記》，累積了豐厚的學養與經驗。在中文譯注尙未進行時，我便於電子郵件中向他請益，承蒙他熱心分享經驗，更確立了我的方向和作法。在譯注過程中遇到書面資料無法解決的疑難雜症，也向他求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第三部《諸島國遊記》第一章第一段分別用“Captain”、“Commander”、“Master”、“Owner”四字來形容“William Robinson”，這四字的意思難以確定，以往的中譯相當模糊，我只得向他請教。他在電子郵件中仔細說明“Captain”爲「船長」，“Commander”實際擔任船上指揮之責，“Master”主掌船上事務，因此也都譯爲「船長」，至於“Owner”則是「股東」或「船東」。以往中譯對此區別不清，以致曾有人將第一部第一章中的“Captain Abraham Pannell Commander”誤爲兩人。譯注本的正文雖然無法像原文般以四種不同方式來形容此人，但至少掌握了正確的文義，再透過譯注來讓讀者了解原文的不同表達方式及各自的用意。

雖然自幼便讀過《格》書的兒童版，就讀台大外文研究所碩士班時也曾以神話批評的角度針對此書寫過報告，但一直要到譯注這本書時才算真正深入研究。爲了符合經典譯注計畫的要求，我除了蒐集不同注解本之外，也廣泛蒐集英文和中文的參考資料，尤其涉及其批評史和詮釋之處，以及不同的中譯本或改寫本，以期建立起英文的批評傳承 (critical heritage) 及中譯本的領受史和系譜 (genealogy)。以往我在撰寫學術論文時固然也曾多方蒐集資料，但類似這樣針對單一文本、配合譯注計畫、長年進行資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料蒐集則是第一遭。由於總覺得可以做得更完善，時間上就相對拉得更長，「動手動腳找資料」縱然未到「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程度，但也幾乎到了個人時間及能力的極限，再加上因為涉及中譯本系譜的建立，所以蒐集資料的範圍擴及中國大陸與香港，至於方便的網路資料更不在話下。中譯本早期系譜的建立就是在前往香港大學參加另一個完全不同性質的學術會議時，抽空前往馮平山圖書館，在馬泰來館長熱心協助下得到突破性的進展。

至於實際的翻譯過程有如障礙賽跑，全程充滿了大大小小的障礙，大到整個篇章的理解、詮釋，文體的抉擇與翻譯，小至一字一詞，都要妥善處理。有些問題當時無法解決，卻又詢問無門，只得擺在心裡，運氣好的話會出現「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情況。印象較深刻的就是 1735 年版前面所加的“ADVERTISEMENT”，內容是說明此版與 1726 年版的不同。一般中、英字典幾乎都做「廣告」解，但置於此書的脈絡卻不符，一直到全書譯出，仍找不到恰切的中譯。那時我也在進行齊邦媛教授的口述歷史。有次與她訪談時，她帶來其尊翁齊世英先生主編的《時與潮》期刊，該刊因為評論時政遭禁，在最後一期的內頁刊登了一篇致讀者的「啓事」，我一看到這個詞甚為欣喜，因為這就是我遍尋不著的用語，拿來翻譯“ADVERTISEMENT”一詞再適合不過了。我也曾在〈翻譯·經典·文學——以 *Gulliver's Travels* 為例〉一文中，以文字、文本、文學、文化等四個不同層次來說明這個經典文學譯注的若干心得。這正是譯注計畫的另一個成果：相關論文的撰寫。

五、研究成果

當前的學術生態以論文（尤其是期刊論文）和專書為首要，翻譯無法廁身其中。然而對經典譯注計畫而言，翻譯與研究是二合一的，甚至可說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翻譯，透過翻譯來反映研究的成果。為了這個翻譯計畫所做的準備工作，以及翻譯過程中的一些心得，自然而然成為我的研究成果，並在國內、外不同場合發表：2000 年出版於《文山評論》的〈翻譯·介入·顛覆：重估林紓的文學翻譯——以《海外軒渠錄》為例〉，以此書第三個、也是最著名的中譯本為例，重新評估晚清翻譯名家林紓的文學翻譯；2002 年出版於彭鏡禧教授主編的《解讀西洋經典：小說、思想、人生》中的〈格理弗中土遊記——淺淡《格理弗》最早的三個中譯本〉和雷阿爾教授主編的《綏夫特研究》中的“Gulliver Travels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Three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Gulliver's Travels*”，以香港之行取得的資料為基礎，建立起此書中譯最初的系譜；2004 年出版於馮品佳教授主編的《通識人文十一講》中的〈翻譯·經典·文學——以 *Gulliver's Travels* 為例〉，從文字、文本、文學、文化四個不同層面，來談論此書的譯注及翻譯文學經典的意義。雖然就目前學術生態而言，這些論文更有「學術市場價值」，卻都是這個譯注計畫的副產品，後來也都改寫、納入全書的〈緒論〉，初稿先請

宋美瑋和王安琪兩位教授過目，臨出版前又經齊邦媛教授過目，三人都提出了一些修訂意見。

六、「周邊設備」

除了〈緒論〉之外，書前和書後還有一些其他的「周邊設備」。為了方便讀者認識作者和該書的時代背景，我在許雅貞、呂潔樺、陳雪美三位助理協助下整理出〈綏夫特年表與大事紀〉，綜合了我寓目的許多資料、年表以及助理協助蒐集的資料，分為「年代」、「綏夫特生平」、「《格理弗遊記》」、「文學與藝術」、「發明與發現」與「政壇大事」六欄，以跨頁的方式呈現。之所以分為這六項是爲了配合此書的特性：如該書雖是奇幻之作卻以貌似寫實的方式書寫，當時的讀者甚至「對號入座」以猜測其中影射的對象爲樂，所以「《格理弗遊記》」一項將主角的行蹤與作者生平及真實歷史對照；「文學與藝術」有助於了解當時的人文與時代精神；「發明與發現」有助於了解英國向外擴張時期的科技與物質文明；「政壇大事」的內容則涉及西方與東方，將該書與作者置於世界史的脈絡，拉近了與中文讀者的距離。

此書爲奇幻之作，主角造訪的大多爲子虛烏有之地（日本是唯一實有其地之處），人物爲向壁虛構，其中有些名稱頗爲怪異，不少甚至是作者自創的字眼（包括當今熱門的“Yahoo”一詞）。因此，書前的〈人物與地名表〉讓讀者可以一目瞭然。書末的參考資料中，第一項「參考版本」列出我當時蒐集到的原著的英文版本以及中、法、德、日等譯本，第二項「綏夫特其他著作」則爲較權威的版本，第三項「評論」收錄較具學術性與代表性的資料，第四項「影片」包括兩部影片（未含更早期的動畫），第五項「網站」則提供最具代表性的網站。這些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齊邦媛教授自 1986 年便鼓勵我翻譯這部經典之作，因此特地請她賜序〈航越小人國〉，至於我的〈前言——尋訪綏夫特〉則是交代個人多年來與此書的因緣，以及翻譯過程中的複雜、艱辛，但更多的則是其中的樂趣與收穫。雖然爲了敬謹行事，前後花了六年時間，遠遠超過了原先計畫的時限，但也因此讓我可以把此書做到自認更接近理想的程度。遺憾的是，此書進行到最後階段時母親重病，終究未能趕在她生前出版，只得於扉頁題辭將此書敬獻給她。

七、反響

譯注本的際遇反映了我國的學術與文化界對學術翻譯的態度。書成之後，由於被歸類爲學術著作，各報依照「慣例」不予書評，反而使得經典譯注的訊息無法循愛書人平常的資訊管道傳播。僅見的書評是李有成先生 2005 年 3 月 2 日於《自由時報》的投稿〈六年辛苦不尋常：讀單德興《格理弗遊記》譯注本〉。齊邦媛教授對此書的熱心程度遠超過我，除了在聯合報副刊撰文，還大力鼓吹，以致先後有聯合報讀書人版和中國時報開卷版的報導，聯合報副刊也刊登了我與王安琪、劉森堯、吳雅鳳、紀元文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等人有關此書的座談會紀錄。其他就是配合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的系列演講以及中研院和各大學的演講。此書出版之後，我曾自購多冊，贈送給海內外的學者專家，得到王文興、余光中、楊牧、李歐梵、鄭樹森、王德威等師長與朋友的肯定。齊邦媛教授自掏腰包買了不少本送給她認為會讀書的人。王安琪教授除了購書贈人，也在課堂上向主修英國文學的學生大力推介。國外的綏夫特專家，如德國的雷阿爾教授，英國的羅思 (Angus Ross) 教授、澳洲的伍理 (David Woolly) 教授雖然不通中文，但以他們的專業立即就能判斷此譯注本在該書翻譯史上的特色。研究該書中譯的大陸學者王惠來信索閱，而上海外國語大學翻譯研究所的謝天振教授更在 2005 年 10 月號的《文景》寫了一篇長達六千字的評介〈台灣來的格理弗〉。根據國科會承辦人魏念怡女士的文章（詳《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八卷三期），此書也成為該年國科會主委年度贈送賓客的禮物之一。

然而該書儘管叫好，卻似乎不太叫座。根據聯經出版公司的資料，除了剛出版時銷售較佳，後來便沉寂下來，甚至有半年只售出 13 本的紀錄，然而接下來的半年卻又上升到 78 本，可見此書雖不暢銷，卻仍有它的市場。另外，此書固然為文學作品，也被當成兒童文學來閱讀，但經典譯注計畫有其嚴謹的要求。這些要求使此書得以和一般譯本區隔，但書前一百多頁的〈緒論〉、書中密密麻麻的注釋以及年表、參考資料等，可能會使一般讀者望而卻步，敬而遠之。其間雖然與出版社討論過印行普及版的可能性，但始終未能實現。我也當面詢問過發行人林載爵先生，有關經典譯注系列在大陸出版簡體字版的可能性。他說，曾經嘗試與大陸一些出版社連繫，但他們只對其中一本尚未有中譯本的作品感興趣。

結語與「首部曲」

總之，國科會在《格》書的譯注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贊助者」(patron) 角色，我也屢屢以「奢侈」一詞來形容此書的譯注，因為若是沒有譯注計畫的支持與背書，在當今的學術生態下，我的研究優先順序中很可能還排不進如此工程浩大的經典譯注計畫（雖然明知其譯注的意義大於我其他研究工作），而去落實齊邦媛教授多年的期盼；若是沒有譯注計畫的要求，我不會如此長時間、大規模地於三大洲蒐集資料；若是沒有譯注計畫的驅策，我不會一次又一次地加注、改寫緒論、增添資料。因為，我清楚知道這是畢生難得的機會，若是錯過，此生很可能再無機會以這種態度和心力投入於一本書的翻譯。

對長年從事翻譯的我個人而言，《格》書的特殊意義在於：

- 時間最長——齊邦媛教授自 1985 年起便殷殷期盼並鼓勵，而我實際著手共花了六年時光；

- 足跡最廣——爲了蒐集資料遠赴英國、美國、德國、法國、愛爾蘭、中國大陸、香港等地；
- 緒論最長——除了十五萬餘字的譯文之外，〈緒論〉長達七萬餘字，照王德威教授的說法，「可以獨立成書了」；
- 譯注最多——譯注綜合了十一個英文注解本、其他研究資料和自己的見解，連同各章之後的「譯者附誌」計有九萬餘字；
- 最符合個人翻譯理念——落實我多年摸索出的「雙重脈絡化」的翻譯理念；
- 最有歷史感——由於落實「雙重脈絡化」，譯注本不再是單一的譯本，而是置於該書自 1727 年第一個譯本（法譯本）出現以來的翻譯史的脈絡以及 1872 年以來的中譯史的脈絡。我雖然無法斷定譯注本在該書翻譯史上的確切地位，但就所看過的資料以及包括雷阿爾教授等國際學者的反應，應該是極少有如此詳細的譯注本。我能確定的是，《格》書在此書的中譯史上極可能是「空前絕後」的紙本（絕對是「空前」，很可能也是「絕後」）。而我目前思索的是譯注本網路版的可能性。

此譯注計畫雖已交出成果，但個人的相關研究尚未完全結束。2007 年 7 月我因另一個研究計畫前往哈佛大學，巧遇韓南 (Patrick Hanan) 教授，他對中文的譯注本及翻譯理念頗感興趣，前後邀晤了三次，相談甚歡。長年鑽研中國小說的他，近年的研究領域在晚清小說，也陸續英譯其中一些小說，並以偵探般的精神鏗而不捨、抽絲剝繭地解決了不少晚清小說的懸案。《格》書的第一個中譯（嚴格說來是「改寫」）《談瀛小錄》1872 年於上海的《申報》連載四天便無疾而終，中譯者是誰一直是個懸案。韓南教授以相當可靠的證據推斷譯者是當時擔任《申報》編輯的蔣其章，英文本則來自該報的創辦人英國茶商美查 (Ernest Major)。此譯注本若有機會再版，將追加此書中譯的「首部曲」(Episode One)。